

工资上涨助中国制造进入新时代

贺军

近期接连发生在南方的劳资纠纷成了一道分水岭,它意味着长期以来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忽视环境与资源成本来维持的廉价“中国制造”模式面临考验和转变。

加工制造业不会大量转移

频繁的劳资纠纷和加薪潮带给市场和政府的一个共同担忧是: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是否会出现大量转移?

如果比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担忧的确很有根据。数据显示,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越南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400-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但明显比中国低。而孟加拉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在此轮加薪潮之后,中国的最低

工资已超过了周边的很多国家。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其最低工资水平都比中国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业环节。香港工业总会近期的一次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不过,大规模产业转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类似富士康、本田等外资厂商,他们在广东不仅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而且多年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集聚环境。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一些外资研究机构也认为,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出口商不太可能将工厂迁往他国,因为中国具有物流、产业链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

富士康近期放话,有意将中国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因为在中国的压力太大

了。不过,这恐怕更多是一种公关策略,以富士康这样的代工规模和代工产品的特点,在全世界都难找到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大规模代工基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企业主担心美国人将生产订单大量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国,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他们劳动力市场也不如中国”。谢国忠估计,目前中国的代工模式,即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还是能够维持的,而且今后10年也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此外,即使有一些工厂搬到其他国家去,这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方面,中国不能把全世界的制造业一口都吃完了,部分工厂搬出去,对世界经济平衡有好处。另一方面,迁移出去一部分低端的产业,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必须的,可以腾出资源来发展相对高端的产业。

应积极培育国内市场

廉价“中国制造”时代的转变,在市场上会不会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冲击呢?这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来分析。

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以来享受着廉价“中国制造”的好处,以至于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输出通缩之源”,拉低了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很长时间内,不能提价几乎成了中外企业的共识。但以加薪为代表的成本上升,会不会让国外市场放弃开始变得“昂贵”的“中国制造”呢?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制造的价值链中,劳动力成本只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1/3;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4倍。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的8%-9%。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倍,西方的最终零售

成本只需提高8个到9个百分点即可。以此来看,国际市场的消费者有能力接受成本的转嫁。

对国内市场而言,未来的市场环境建设和政策调整应该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关注出口,关注对外部门,而国内市场被普遍忽视。反映在市场环境上,对外经济部门的环境较好,动作规范,交易成本很低;而国内市场则严重缺乏规范,市场混乱,交易成本很高。

在“中国制造”成本上升的同时,中国内需市场也迅速增大。中国的定位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许多外资已经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已经开始转变。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外资的内销比例在不断提高,现在29万家外商中,占比63%的产品要销售到中国,出口仅占37%。国内最新一次对150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跨国公司继续选择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主要原因首先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很多外向型企业来说,未来向中国市场的转型是必然的。

打破国内市场的各种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应该成为中国政府今后的重要任务。我们在与许多内资和外资沟通时都了解到,他们在中国市场最希望得到的不是各种税收优惠,而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希望市场环境可预期、透明度以及法制化等。

如果国内市场环境建设能够有效,将会有效地抵消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仍然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同时有助于国内外向型企业向国内转型,而这与中国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焦点评论

经验之谈

公共服务要学吴起、神木算账术

毕晓哲

据报道,陕西吴起将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从学前到高中的全民免费教育。2007年以来,吴起县在教育上累计投入总计8.5亿元。去年,吴起已成为陕北地区石油资源区面积最大、石油产量最多的县。其生产总值达到81.87亿元,财政总收入27.5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高达16.07亿元。

陕西出了两个让社会公众感喟不已的“标杆”:一个是率先在全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陕西神木,另一个就是时下被人热议的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陕西吴起。两个县为什么敢为天人先?敢率先在惠及民生的医疗和教育事业上“吃螃蟹”?说到底,还是地方政府善于算账、会算账。

说到算账,任何地方政府都会。但算什么样的账,以谁的利益来算账,结果却截然不同。陕西吴起县委书记曾说:全民免费教育一年的财政支出约5000万,还不够修一公里高速公路的。从延安到吴起修高速,1公里要8000万。延安到吴起110多公里就要100个亿。政府可以贷款100个亿修这条路,为什么就不能一年拿出5000万让孩子重返校园,享受教育资源呢?

如此算账,是建立在于以民生利益为重的角度上的。钱可以用来修公路,也可以盖大楼,而吴起县也只不过是将其财政收入更多的分配给了教育和民生。这样的算账法,其实算出来的是民生账和关系人才培养的社会发展长远账。当地官员还认为,吴起的石油至少还可以再开采50年,而免费教育坚持到那时,

吴起早已人才辈出,人才将会创造比石油更巨大而长久的财富。如此算账,令人欣慰,也真正算是一笔有利于长远的科学发展账。

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投入,都关系民生福祉,能不能搞得好看怎么算账。陕西神木认为,“花了1.5个亿,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爆发出来生产的热情,这种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巨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神木的发展,说实话要算经济账的话,我们政府赚了一大笔钱。”所以,这也是一笔明白账。陕西神木和吴起一样,同样算出来的是一笔极为清晰的明白账,这样的算账方法值得喝彩和尊重。

会不会算账,根子还在于是否有真正为民谋利的决心。一些地方经济极为发达,GDP已“富可敌国”,但免费医疗、长达15年的免费教育却迟迟不敢提及;一些地方在盖办公大楼、给官员政绩“涂脂抹粉”上不差钱,但涉及民生教育和医疗投入上却抠门得很。

实际上,以医疗保障较为成功的香港为例,香港政府每年仅用GDP的2%的投入就已经满足了90%的人看病、住院报销。年仅2%的国民教育投入,哪一个地方政府“紧紧手脚”做不到?像陕西吴起那样压缩公车开支,难度并不大。再加上一个县“仅相当于一公里高速公路”的财政投入,普及起来并不难。关键还是看一些地方政府算的是什么账,究竟是私利账、“小团体账”?还是“长远账”和“民生账”?

经济时评

投资客扫楼喀什风险大过收益

陆志明

继海南借力“旅游岛”概念疯狂炒房价之后,内陆边疆城市喀什再次借道“特区”概念提升楼市。从今年3月两会”上传出要在喀什建立经济特区之后,香港、广州、温州等地的炒房团蜂拥而至,将整栋楼和整个单元买下,致使房价一路上涨。喀什最繁华的环疆片区楼盘起价3450/平方米,最高楼层售价已突破4000元;而商铺的价格也从一万多上涨至三四万每平方米。

在新“国十条”定调打击楼市投机,还商品房居住消费属性之后,上述报道令人称奇,也令人怀疑。因为,早已有相关报道揭露出,曾有内地开发商给予温州炒房团出车费,以达到吸引眼球炒作的目的。姑且不论这则消息的真伪,在楼市宏

观紧缩的大背景之下,投资客扫楼二三线城市未必是规避一线城市风险的最佳选择。况且喀什作为边疆欠发达地区城市,其真正居住投资价值几何尚存不小的争议。

首先,在楼市系统性风险背景之下,投资二三线城市风险实际更大于一线城市。对于投资客而言,投资二三线城市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心理对赌成本较低。相较于京沪深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二三线城市普遍单价较低,如上述报道中提及的喀什环疆区最高层楼盘也仅4000元左右。但是实际上低单价未必意味着低总价,成栋成片扫楼下来,资金成本同样不亚于一线城市。

此外,投资客到二三线城市扫楼带来的“垄断供给”心理暗示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从根本上来讲,一线京沪深广与内陆二三线城市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其城市个

财经漫画

农行申购



实话实说

化解债务危机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王焱

6月10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年内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并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据估算,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

化解地方债务危机确实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事实上,从3月份以来,包括银监系统在内的多个部门,先后将“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融资平台企业信贷风险隐患”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并开始清查地方债务。但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即使卖地还债,也需要6年时间。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政绩考核和政府职能指挥棒之下,各地方政府日趋公司化,中央决意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遭抵制也就不难理解。在去年保八压力下,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大项目大工程纷纷提前上马,地方财力所限,必然通过借债解决。

债务危机由此而生。必须承认,错误的GDP发展思维和现有的政绩考核方式密切相关,同时分税制也是原因之一。

地方政府负债率高成因复杂。首先是各级官员对政绩工程的热衷,因为这些工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于其升迁和外部评价效果明显。此外,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地方政府只能过多介入经济之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政府机构臃肿,政府背景、关联企业过多,而这些企业往往担负着过多的经

济发展、基础设施、城建方面的任务。这往往容易导致以政府信誉为担保,大量的信贷被释放出来。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现有行政体制和财税制度所致。

所以,地方债务问题应该上升到行政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高度来审视。若只是单纯地用信贷和行政手段化解债务,最终只会导致旧账去了新账又来,循环往复。当然,债务危机的产生,也是现有经济结构所致。但要看到,调结构之所以难,也是现有GDP为主导的绩效考核方式所致,地方政府当然愿意上大项目、上大工程,因为大项目见效快容易出政绩,自然对于长远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够用心。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就是经济介入型政府,变革的方向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淡化经济结构论,应该提高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指标的比重。

固化的利益结构和低效率的行政方式以及公众在变革中的参与程度有限,注定了改革不是轻易之事。但是债务危机,最终要有人买单,表面上看是银行风险,或者上一级政府的责任,其实最终买单人还是普通公众。因此,很有必要知难而进。从实际出发,能够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是政绩考核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引导和扭转地方官员观念、思路上的急功近利。而一个好的政绩考核机制,应该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发生根本性的影响,使其注重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社会保障的完善。

不吐不快

楼市全面调整 应变“可能”为“必然”

魏文彪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4日在大连举行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量跌价滞的态势,再过一个季度左右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面临全面调整,房价会有所下降,但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4月中旬中央开始了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广大民众期望尽快实现房价下降,以实现买房梦。但时至今日,尽管各地房屋成交量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是房屋价格却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调控的效果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形下,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表示,“再过一个季度左右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面临全面调整,房价会有所下降”,无疑又让广大无房户与渴望改善居住条件的民众充满了期待。

不过徐绍史在房地产市场会面临全面调整前使用了一个“可能”限定词,这就表明房屋价格将会下降依然只是一种推测,而并不具有某种确定性与必然性。需要看到的是,中央自4月中旬以来出台的系列调控措施力度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中央稳定房价、改善民众居住条件的巨大决心,在这种情形下,房地产市场出现全面调整显然应当具有必然性,否则会损害中央政策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与此同时,房价过高不但导致许多民众无力购房,而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另外,如果任由房屋价格继续

涨,将会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体系安全埋藏下更大的隐患。所以,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必需取得实效,在促使房价出现下降上没有退路可言。

而要变“可能”调整为“必定”下降,除了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项调控举措并将其落到实处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继续出台更具威力的后续调控措施。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进行至今,房屋价格所以尚未出现实质性下降,很大程度上与此前出台的调控措施主要是提高投机者贷款炒房成本,而并未提高投机者的房屋持有成本有关。所以,在投机者炒房并不完全依赖银行贷款,提高贷款成本并不能真正触及炒房者利益情形下,中央显然应当尽快开征房产税,以挤压投机者通过炒房所能获得的利润空间,迫使其不能不较大幅度地降价出售房产,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加房地产市场会面临全面调整的确信性与必然性。

另外,近些年来房屋价格普遍畸涨,此前数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收效甚微,地方政府助推房价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地方政府继续奉行土地财政策略不变情形下,房地产市场显然难以真正出现全面的实质性调整。所以,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要能真正取得实效,更需要通过有效制度设计斩断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利益关联,消弭其从房地产市场牟利的欲求与能力,如此房价全面调整才能成为必然,而不至于只是“可能”。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